

序

王田葵

唐代儒学正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从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儒学为正统,吸收道佛成为唐代思想的主流。在这种一元独尊、多元并存的思想环境下,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柳宗元,在儒、道、佛诸领域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其思想之开阔,理论之深邃,尤其是关涉社会体制的演变,重视“生人”的政治主张以及“官为民役”的官德思想,常能抉发令人警悟的深刻见解。

柳宗元三十三岁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了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几乎在一刹那间,短暂而烦嚣的“永贞革新”失败了,他被统治者从政治旋涡中心贬到了蛮荒之地永州,担任有职无权的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不仅无政务可做,而且时时受到朝廷监视,“与囚徒为朋”。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几乎每天都在盼复出、量移的诏书,又几乎每天都在孤独和忧患中度过。“天道悠悠,人世多虞。寄心双表,长恨囚拘”,这诗句,垒积了柳宗元多少沉重的身世之感!就这样,他一面瞧着皇上的脸色,一面舔舐着自己心灵的创伤,一面磨砺着自己的意志,在永州度过了悲剧性的十年。这是他人生淬火的十年,也是他创作最辉煌的十年。

十年等待“等”来的却是被贬到更边远的“岭外”,使其哭笑不得的是,也许因其姓柳,便玩笑式地授予柳州刺史之职。无论是官位高低落差之巨,还是官场荣辱和世态炎凉变化之速以及官德正邪体察之深,柳宗元都可以称得上中国封建专制王权政体下,在官场中挣扎得最惨烈,精神磨难最沉重,官德体味最深切的一位政界、文化两栖知识分子。

实在说,柳宗元称得上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却算不上唐代自成体系的原创性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精神负累决定其官德思想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在政府体制内分崩离析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时,柳宗元亦或再多一点道德官员,纵然欲以一己之道德智慧对抗黑暗,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结果也只能是幻想而已。况且,柳子一生都在“瞧着皇上的脸色”,这种待重用的精神症候并没有让他成为反腐英雄,像汉代荣获官场“清洁工”美誉的蒙遭党锢之祸者们那样。那些反腐英雄在当时就被人们尊称为“三君”、“八俊”。柳子官德之论不可谓不精微,对官场之腐败不可谓不愤恨,然而,他的批判和议论,也只能看成是一种牢骚,对唐代官制的改善和社会的拯救自然显得无能为力。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腐败与政治体制相连。

中国两千余年专制独裁王权政治历史一再证明,当权力可以加速转化为财富之时,也是“垄断”加速转化为“腐败”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官场的腐败就不仅仅是一种零散的、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了。社会一旦进入这种状态,离“皇胜更皇囚”的时间还会太远吗?

作为湖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的李钟麟同志,在攻读研究生期间亦或在教学之余早就对柳宗元哲学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被吸纳为柳宗元研究所成员。之后,他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陆续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李钟麟同志对柳宗元官德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从柳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现实官德透析的角度看,都是颇有眼光,颇有知性责任之举。

邓正来先生说得好:“我们必须首先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邓正来教授受聘吉林大学就职学术演讲)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已经所剩无几了。

当下,一些人高数量生产劣质的学术产品,另一些人用学术研究项目费出版劣质书籍已成时症。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学术

创新,而且对真正埋头苦干的知识生产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嘲弄。然而钟麟同志能以止水心态笑傲这种时症。他这种坐冷板凳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这部视角新颖、内容详实、逻辑严谨、文风简洁的著作,就是证明。

李钟麟同志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一位在教学和学术上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他希望我为他写一篇序言,其实,我从他的书中得到了不少启迪,学到了一些我平时没有掌握的知识,同时,也思考了一些平时没有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得感谢钟麟同志,趁着这部书出版之机,让我发表上述看法。

2006年8月12日

于永州西山拙斋

自序

“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他在众多的理论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其思想开阔而活跃,理论细密而精邃,代表着一代思想理论的高峰。”(《柳宗元评传》前言)孙昌武先生对柳子的评价颇为公允。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是他政治仕途上的不幸,却玉就了他思想上、文学上的辉煌成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生活在永州,工作在永州,我对柳宗元的忧患意识感慨万千,对他研究兴趣渐浓,2002年我加入柳宗元研究所,开始致力于柳子的哲学思想研究,略有收获,也陆续公开发表了一些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常有一些问题让我兴奋,尤其他为官的道路让我感喟,为官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他从科举及第到贬谪永州,坚守为人为官的信念,矢志不移,即使忧愁病苦,也不改初衷。联想到廉政建设的今天,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共产党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呼声越来越强,干部的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柳宗元为官思想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柳宗元一生从政,少壮时理想高远,豪气干云,以为青紫可拾,功业易就,于是将身许国,全力以赴,杜绝了一切犹豫彷徨,萎缩怯懦,也不再考虑后路,准备为唐的中兴轰轰烈烈干上一番事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极其严酷的政治打击,顷刻间便粉碎了他人生的所有希望,一身去国,万死投荒,从此便开始了他那如同被抛弃、被囚禁般的贬谪命运,开始了他在遥远空间和漫长时间双重折磨下的无尽等待和煎熬,他身处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放弃,没有沉沦,忧国忧民是他的思想核心。在偏僻的山区,看到老百姓的疾苦,他忧心忡忡,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批判呼声,对当时的官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官,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认为为官者必须“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官为民役”,“遂人之欲”,才能使“民利民自利”。然后做了大胆的解释:“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

力,可无报耶?”在《送薛存义序》中表达的更为明确,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官为民役”的光辉主张,在柳州执政四年多的时间里,柳宗元精于政理,勤于政务,他废除了奴俗,释放了奴婢,破除迷信,去鬼息杀,开荒凿井,劝农生产,修复孔庙,兴办文教,为柳州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柳宗元为人正直,刚正不阿,鲜明地表现在对王叔文集团“负罪者”被贬的看法上,他还极力推崇“质厚不谄,敦朴有裕”的品格;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勤心劳力、廉洁奉公,在《牛赋》一文中明确表示甘愿做牛,在《瓶赋》中,坚定地表达自己“宁为瓶之洁以病己,无以鸱夷之旨以愚人”,在《螾蜋传》中对贪官污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说他们“日思其高位,大其禄,贪得无厌”,在《捕蛇者说》中,对当时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提出了严正批判,用“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的话刻画出吏役的横暴。他为官一生,非常的清贫,被贬永州,居无定所,在宦海风波中,任过尚书省的礼部员外郎,又以州牧而终,然而去世时室如悬罄,连自己的丧葬费也没有,遗孤只得托付友人照料,真可谓为官时廉洁奉公,人去时两袖清风。柳宗元最眩人的在于他的人品和官品,最富足的是他的精神,这难道不是他为政之德最好的概括吗?为政以德,不就是官德吗?基于此,我把此书取名为《柳宗元官德研究》。

本书共八章,从儒家文化的治国思想来看待柳宗元的官德思想,最后谈及他的现代价值,其中吸纳、融汇前贤多方面的成果,未能一一注明,谨致谢忱;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要衷心感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从事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王田葵教授的关怀和帮助,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邹小阳女士在校稿等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编纂时间较为紧迫和个人能力有限,书中错误在属难免,亦盼方家读者不吝示教。

2006年7月于永州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官德传统的形成	(1)
一、官的由来与官德的产生	(1)
二、传统官德的内涵	(5)
三、官德的基本特征	(19)
四、传统官德的评价	(24)
第二章 儒家“为政以德”的现代走向	(33)
一、“为政以德”是儒家治国思想的精髓	(33)
二、加强官德建设的时代意义	(36)
三、官德建设的对策思考	(39)
第三章 柳宗元为官目的论	(43)
一、柳宗元以前的民本思想概述	(49)
二、人民性是柳宗元官德思想的灵魂	(52)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实践之路	(69)
四、柳宗元以民为本思想的渊源	(72)
五、柳宗元以民为本思想的评述	(76)
第四章 柳宗元为官用人论	(78)
一、中国传统用人思想	(78)
二、柳宗元的用人思想	(92)
三、柳宗元用人思想的现代借鉴	(105)
第五章 柳宗元为官修养论	(112)
一、为政清廉历史渊源的回顾	(112)
二、柳宗元的清廉政风	(117)
三、柳宗元清廉政风的现代启迪	(132)

第六章 柳宗元为官风格论	(138)
一、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138)
二、柳宗元的科学思想	(146)
三、柳宗元的“务实”思想	(153)
四、柳宗元“务实”思想的现代启迪	(165)
第七章 柳宗元为官职责论	(168)
一、敬业是对中国古代职业道德的概括	(169)
二、敬业是柳宗元官德思想的关键	(176)
三、柳宗元敬业精神的当代启示	(218)
第八章 柳宗元官德思想的现代价值	(225)
一、官为民役	(225)
二、仁民爱物	(227)
三、公正无私	(230)
四、廉节自守	(231)
五、尊贤惜才	(234)
六、求真务实	(237)
主要参考书目	(239)

第一章 中国官德传统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大舞台,那么,每个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角色”,社会舞台没有纯粹的“看客”。每种“角色”都是社会的安排和定位,并有相应的规范,其中就有道德的规约。因此,治学的有“学德”,执教的有“师德”,行医的有“医德”,从艺的有“艺德”,经商的有“商德”,做官的有“官德”。“官”是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官者,民之表也。”为官者居于社会舞台的中心,是广大百姓的代表者、带领者、遵从者,客观上存在着使百姓瞩目和遵从的权威性,因而,无论本人是否自觉,他们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某种诱导信息而为众人接受并进而仿效。“上有所为,下有所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官德”放在为官从政的首位,提出“德,国家之基也”,“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等一系列主张。为之,人们对其抱以最高的道德期望。就此而论,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官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境况。随着现代民主进程的加快,以终身制为主要特征的官的职业化趋势正在淡化,代之以变动性为特征的官的角色化趋势正在增强。在此,我们从古代官制的演变到今天的干部制入手,分析官德的本质及其特征。

一、官的由来与官德的产生

官,是个最具中国特色、口语化、大众化很强的字眼。什么是官,古人曾作过许多解释。《礼记·王制》疏中载:“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说文解字》中曰:“官,吏事君也。”马端临在《通考·

自序》中把官称为“役民者”，即“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这些解释说明官的身份和权力地位是有很大的变化的。但“官”的基本要义是社会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执行者，用现代语言说，就是“领导干部”。我之所以在标题上没有使用“干部道德”这样的概念，一是“官德”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有更大的适应性，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说起“官德”，用不着过多的解释，人们从生活经验层面也能说出一二三条；二是“干部”之类的概念本身不太精确。干部是一个外来词，是英语 cadre 的译意，原意指框架，到 18 世纪末逐渐用以指军队中的核心组织以及全体军官，到 20 世纪初才用以指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大量使用干部这一概念，至今干部概念比较笼统，主要泛指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区别于“工人”。如果把这层意义的“干部”同“官”等义，当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列入干部系列时，丝毫也没有半点“官味”，甚至有些莫名其妙。“干部”一类的词，从直觉上给人以浓浓的“革命”意味，缺乏足够的文化内涵，不宜再使用。以至于田汝康先生认为，“要是感到政治局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所谓‘干部’应该负大部分责任”。〔1〕如果硬要把“官”和“干部”扯到一起，恐怕只有“领导干部”才属于“官”的范畴。在本书的行文中，当我特指当代中国的“官”时，还是使用了“干部”或“领导干部”之类的概念，以便于同目前的语境相吻合。

官德，是指以维护国家政权及其领导群体和个体的良好形象为目的，以一定阶级的政治信仰为导向，由主体信念、行政评价、公共舆论、政治文化传统等形式维系的制约领导机构和领导个体

〔1〕 参见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4 月出版，第 400 页

行使国家权力,参与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体系和修养水平。

官德,反映了统治集团对自己独特的身份和行为规范的确认,以及为了维护自己阶级和集团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而对自己直接利益需要的克制和行为方式的调整。这种对直接利益需要的克制程度和行为方式的选择,最终又是受该统治集团政治信仰和社会目标追求支配的。另外,官德又是附着于官员的整个运权过程和生活过程的,是为了树立整个官员队伍的良好形象,以达到强化权力影响力的效果。官德修养水平的高低最终都要通过实践来表现和检验。

中国官德的产生和发展同官及官制的起源密切相关。

官起源于黄帝时代,真正具备国家职官的形态是从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王朝开始的。官是由部落首领发展而来的。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论述,每个国家在产生之前都经历了由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过程。原始氏族部落首领是由部落选举产生的,部落的所有成年人都有权进行表决。选举的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部落酋长负责处理部落的日常事务,负责实施部落议事决定的主项,主持宗教祭祀和节日大典,处理氏族间的纠纷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由原始的采集野生植物进化为种植稻谷时而产生了农业和牧业,出现了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分配和贸易。这时的社会活动仅靠部落首领难以应付。官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第一批问世的官员是“五行之官”。据记载,黄帝以五行为官,按中、春、夏、秋、冬为职,“五官”即春官本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玄冥)、中官土正(后土)。可见,官的产生是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前提的,这个前提也是官德的根本所在。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间有一个地域性的部落联盟时期,也就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其特点就是以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追溯

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经尧、舜、禹,直至夏的建立。尧帝时,已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已相对提高,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部落联盟中的贵族阶级联合起来,设立了百官,官员由各联合部落的氏族首领,即帮伯、师长、酋长等担任。《尚书·尧典》上有“平章百姓”的记载,含义就是处理百官事务。历史上有传说尧舜为公禅让的故事:尧帝老年时,想物色一个年轻能干的年轻人接替自己的职位。有人推荐他的儿子丹朱,但尧终因丹朱“不肖”,不让他继位,而让品德高尚的舜继位;舜年老以后又传位给有为公献身精神的禹。舜帝时有管水土工程,管教化,管部民事务,管刑法等官职六十,这些官职都是为大众利益而设置的。这时的氏族首领道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公为民的思想比较突出;二是这些官既是社会的主要管理者,又是道德上的典范。他们认为,修德能得天下,用自身的道德威望可以协调内部矛盾,以团结对外。《韩非子》里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1〕

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末叶,禹的儿子启自封为王,建立了夏王朝,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自从有了国家之后,其统治机构不断调整,职官的种类和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禹以前的部落首领是民主推举,即所谓“禅让”制度。后废除了“禅让”制度,实行世袭传子制度。从此以后,“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实袭继位,便成为制度了。王位世袭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步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在上层建筑中所必然引起的结果,它从制度上确认贵族家庭世代垄断氏族首领职位的特权。从此“公权”就转化为“王权”,集权制取代了民主制,权力异化成为可能。这种变化给官德建设带来了两种影响:一是官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1〕《韩非子·五蠹》

日趋重要,因为社会发展和百姓安宁基本上取决于君王是否“英明”和“德厚”,政治生活中的人格崇拜由此产生;二是官可能成为道德上的特殊“公民”,或者促成道德上的虚伪,尤其是对至高无上的“君”而言,道德完全成为一种主观好恶,他本身就是“王法”、就是道德,实际上造成道德上的专制和不平等。

二、传统官德的内涵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古代官员的道德建设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翻开中华民族史,自从有官以来,那些有远见的“明君”们,为了长治久安,都十分警惕国家官吏的腐败问题,也因此都十分重视“官德”问题。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武王时,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百官用箴言以诫武王过失。“箴”,就是规谏和告诫的意思。

唐以前的官箴,主要是规谏君主皇帝,唐之后的官箴,则主要是针对文武百官的。

到宋、元时代,官箴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在当时循良之吏、守德之官们,不但自己践履官吏道德,而且还结合自己的为官之道,写了不少官箴书,在官德的内容要求上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宋代的吕祖廉在其《官箴》中,就提出了“清、慎、勤”的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是“千古不可易”的官德。

到明、清时代,官箴书进一步成熟发展。如清代的汪辉祖曾为乾隆年间的进士,为湖南宁远知县,政声卓著。他将为官道德概括为: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心为尚,俭为立品之基,勤为尽心之实,等等。

中国传统官德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忠爱国

官员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权力意志的执行者,追求统

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抱负,是官德定位的基本价值尺度。这是官德的大德,是其修养和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则,是对官员最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忠诚,是官员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若没有对国家利益和本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认同,没有清醒理智的道德评价,没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勇气和百折不挠的道德意志,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公忠还是私忠,其道德价值是截然不同的。

“忠”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重要的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中,公忠不仅被看做个人“修身之要”,而且被定位为“天下之纪纲”、“义理之所归”。《说文解字》对“忠”的解释是“忠者,敬也”。清人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也。”其本意就是尽心尽意。传统上“忠”的要求,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每个人都要加强自身修养,做到至公无私。诸如“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1〕}“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2〕}二是各级官吏必须忠于职守,这是为国效忠的表现。如《诗经·采芣》之“夙夜在公”。^{〔3〕}三是国家民族出现严重危机和重大灾难时,临危不惧,以身许国。“临患不忘国,忠也。”^{〔4〕}孙中山先生也曾说:“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所讲的

〔1〕 罗国杰.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18.

〔2〕 罗国杰.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22.

〔3〕 姜亮夫,等. 先秦诗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27.

〔4〕 罗国杰.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29.

“公”，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在利益上，指社会整体，是与私对立的。古代有道德的为政者很看重“公”字，认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西安碑林博物馆清朝颜检官箴“戒石铭”），这段铭文深刻地道出了为官要公的重要性。二是在价值上，指公正、公平。“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是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故治国必“公”。“天下为公”的传统官德在阶级社会里虽带有空想的色彩，这种追求也显得软弱无力，但它表达了人民群众追求理想社会和理想道德人格的希望，也成为历代官德的最高标准和终极价值。我国古代形成的忠、孝、节、义，第一位的是忠。忠，位列为官的基本道德规范“忠”、“仁”、“正”、“俭”、“廉”、“勤”之首。这里的“忠”指尽心竭力，忠诚无私。“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贼民之主，不忠”（《左传·宣公二年》），后来特指对君主的忠诚。把忠君看成是爱国，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忠”作为官德，强调的是以身报国，尽力成就事业，尽力帮助别人，并且始终如一热爱国家、忠于祖国、忠于事业的精神。这种精神，为历代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所提倡。孙中山不但提倡“天下为公”，而且强调说：“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人民可不可以呢？忠于事业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扬这种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岗敬业”、“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为官者的职业道德。

与忠君相联系的是报国，是否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是衡量官吏道德的重要标准。“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谏院题名记》），“以天下为己任”是古代士大夫代代相传的座右铭，是一大美德，表达了有识之士的理想和抱负。毫无

疑问,这种传统美德是不朽的,因为官员的职责是治理好国家,“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责任。这一美德所规范的是官员为官的目的。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黄宗羲的“扶危定倾”,尽管带有激情的道德呼唤,但本质上都是要求官吏以报国为己任。

忠君爱国是中国古代入仕者的传统美德。像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历代为官者的楷模。历史上以“不贪为宝”、拒受贿赂的宋国司城官子罕,“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的司马光,铁面无私、清正廉明的包拯等清官,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而贪婪无比的严嵩,贪赃枉法的蔡京,谗害忠良的秦桧,擅权纳贿的和珅这些贪官污吏却万人唾骂,遗臭万年。“忠”与“奸”成为评判为官者伦理人格高尚与卑下的根本标准;忠臣与奸臣成为从政官员泾渭分明的两种代表形象。这种忠君爱国教育,使为官者不忘忠于朝廷,忠于职守,是为政清廉、反对贪污腐败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仁慈待民

官者,“管”也。管谁?管人,管下级主要是管平民百姓。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各级官吏,都只是中央政权的代表,代“天子”以行政,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民众、国家、君主的关系。把人民看做是国家的根本,这是传统官德的精华。早在先秦时期,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尚书》中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他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点。荀子进而以舟水相比喻: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周公秉承“崇德，尚礼，利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实行“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左传》昭公26年）的治国策略。孔子效法周公，也提出“足食、足兵、民信”等安民利民的治国观点，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所重的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民列第一。指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以民为本还体现在为政者要懂得顺从民意，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本思想在行政行为上还表现为亲民爱民体恤民间疾苦的人文关怀精神，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王阳明也说过，同民好恶，固为政大要。要有爱民之心、顺民之意、惠民之实。

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政治实践中看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认识到政权如舟，民众如水，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他们继承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对入仕前的学子和从政后的官吏不断灌输民为邦本的思想，告诫为官者要有爱民之心，利民之举，要宽以养民，爱民如子，得民心，顺民意，察民性，恤民苦，取信于民。为官者，只有心系民众；为民造福，才会清正廉洁；以民为本，勤政为民，才能吏治清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无一不是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之人。民本思想的教育，从国家兴亡战略高度要求和告诫各级官吏清正廉洁，富民强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德，超越了国与民、官与民之间主要以利害制约关系维持的重民与惠民观念。从哲学本体的高度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广大干部的唯一宗旨。因而社会主义官德的民生与民意取向更具有决定性和彻底性，官德的民生与民意取向同官员的政治抱负高度一致，即“对党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对上级负责与对下级负责的高度一致”。

(三)立身唯正

所谓“正”，就是公正，包括公平和正直两个方面的含义。公平要求人们无所偏私、合情合理地按一定原则待人处世。正直就是心胸坦荡，坚持原则，从政不奉奸，交往不媚俗，事事出以公心和坦诚，立身唯正是一个为政者基本的官德。

《尚书》中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一是正直，二是能刚，三是能柔，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把“政”解释为处事公正、行为端正，这是对“政”字的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孔子特别注意到统治者颁行的政令能否得以切实执行，同统治者自身的正与不正有密切的关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行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政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身为家之本，国为家之本，故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儒家十分重视“修身”，并提出了一套在道德教育中促进人们“修身”、“养心”的方法。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提倡“养性”，扩充内心的“善端”。《大学》则进一步认为，“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大学》的修身为本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些社会道德规范由外部权威的必然性变成个人主体的内在自觉要求，也即在自身中找到证实。如果不能“知本”，那么个人主体的人格理想的践履、德性的成就和完善，就不能转化为外在政治上成功的杠杆。中国传统官德十分强调做好官先要做好人，“正人”思想更强的是“正官”。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